

“脑体倒挂”考

朱 明

(上海科学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)

编者按 在举国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”、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声中向现代化奋进的历程中,“脑体倒挂”久拖不决,已成为一个对国家,对民族,对全体社会成员难以理解,难以接受的难题,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,更是苦不堪言,斯文扫地的一块尴尬“心病”。这个问题所造成的“教者不安,学者无心”的这一现实的“读书无用论”,已构成了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社会主义事业未来方向的一个极大的危险误导。近十年来,国家最高领导人,曾几度决心、几度部署,要解决“倒挂”,但终因“中梗阻”,功亏一篑。据说主要是怕在工农中摆不平。其实,现在的知识分子,绝大多数是工农家庭子弟,全社会都知道,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他们都是国家、社会、家庭层层优选最多、最严,投入培养精力、财力最多的出类拔萃的子弟。到头来,这些子弟在社会、家庭中普遍面临“倒挂”的不公,同样是广大工农家庭中最始料不及、最难以理解、最难以接受的“父母心结”。可以说,从根本上解决“脑体倒挂”,已是全民族,全社会的一种理性诉求和感情愿望,完全没有什么“摆不平”、没有什么“想不通”。整个问题的症结,确实是始之于“左”,梗之于“左”。我们希望这篇《“脑体倒挂”考》,将有助于突破“左梗阻”,有助于最终解决这个危及中国未来前途的一大“社会梗疾”。

中国“四化”,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。科技现代化,关键是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。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,关键是“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”。因此,认真解决知识贬值,解决“脑体倒挂”就成了重要方面。

就企业讲,企业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。搞活企业归根到底是搞活人,尤其是有知识的人。只有这些人“活”起来了,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源源不断开发出来,才能挤进国内国际市场,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而要让这些人“活”起来,“脑体倒挂”必须解决。知识贬值、“脑体倒挂”是至今未除的“左”的恶果之一,须尽早根本解决。

什么是“脑体倒挂”?就是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别,不是正常的缩小,而是倒了过来。通俗讲,就是民谣所传的“造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”,“十个黄猫九个雄,十个教师九个穷”,等等。长此以往,如此这般,谁还愿意“十年寒窗苦”?又哪来的现代化?

可见,这的确是极为重要的问题。也正是因为此,多年来“脑体倒挂”成了热门话题,政协、人大也每会必议。不仅两会,不仅知识界,不仅全中国,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“倒挂”。为什么?因为“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”,太离谱了,太稀奇了;因为它对中国未来发展影响太大了,也太重要了。

但是,议论虽然不少,而“脑体倒挂”这个怪物究竟从何而来?何时而起?怎样才能解决?却还没有见到几篇文章谈得清楚的。外国人不清楚,中国人也不清楚。本文基于历史考证,试图探个明白。

“脑体倒挂”不是外国引进的。

十年改革引进了不少“洋货”,而脑体倒挂也正是近十年严重起来的,于是难免有人以为“倒挂”这个怪物也是从外国引进的,这是误解。因为除野外作业、危险职业、超强劳动等个别行业体力劳动理应报酬较高外,总体来讲,全世界 180 多个“外国”,还没有听说几个是“倒挂”的。

美国,据官方统计,1976 年美国科学家、工程师的平均年薪是 2.3 万美元,工人是 1.2 万美元,“正挂”一倍左右。

前苏联,据统计,1987 年工程师每月职务工资最低 140 卢布,最高 280 卢布,仅此一项,就已经相当于、甚至超过普通工人的工资了。

据《青年非洲经济》介绍,非洲的一些穷国“科研人员困难重重”,“2/3 科研人员工资不高”,“需要靠第二职业贴补生活”。但他们的工资仍是低工资工人的 1~5 倍左右,并无“倒挂”。至于律师、医生等行业中的知识分子收入就更高了。

可见,脑体倒挂不是“洋货”,也与改革开放无

关。

“脑体倒挂”不是封建遗传的。

唐宋元明清,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“读书低”的时候。恰恰相反,脑体差别(“正挂”)太大,历代封建王朝盛行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贵族思想。

可见,“脑体倒挂”不是“古董”,而是“新品”,与封建传统无关。

“脑体倒挂”不是旧中国留下的。

民国,无论是孙中山、袁世凯、蒋介石还是李宗仁当总统的时候,字典里都没有“脑体倒挂”这个辞。面对80年代不少教师斯文扫地,老作家冰心十分感慨。她曾谈及民国时的情况:那时的知识分子虽然备受歧视,“但毕竟有一个高薪撑着,还可以自鸣清高”。

孙中山的“三民主义”是讲“均富”的,这些年台湾做得也比较认真。现在台湾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是富起来了,但知识分子并没有穷。台湾的城乡差别,脑体差别也日见缩小,但绝没有倒过来。据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介绍:1986年底,台湾各业员工平均月薪约600美元。其中研究生以上者1050美元,大学程度者935美元,高中程度者548美元,小学程度者450美元,仍然是“知识越多越富裕”。

可见,我们的“知识越多越穷”和“脑体倒挂”,也与“民国”、“国民党”无关。

“脑体倒挂”也不是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就有的。

自70年代末以后,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年都要议论“脑体倒挂”,已经论了十来年了。据报载,一位人大代表讲,50年代,中国最小的知识分子——小学教师,起薪也有60元,可以买500斤大米,或100斤肉,1000个鸡蛋,还不算少。至于“中知”、“高知”,日子就更好过了。1956年工资改革时,工程师、讲师的起薪是90元,一般多在百元以上,最高是135元;高级工程师、副教授的起薪是157元,一般多在200元左右。与那时的物价相比是相当可观的。当时,一个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几元,雇一个保姆也才十几元。所以,一“知”养一家还能雇保姆,下了班也能“一心扑在科研上”。这种情况在50年代是相当普遍的。

可见,“脑体倒挂”同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,也没有必然联系。

“脑体倒挂”与马列主义无关。

考查书本,马列经典著作中的确写上了要逐步缩小,直至消灭脑体差别,但从没有说要倒过来。相反,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,都明确指出和论证了“复杂劳动是数倍的简单劳动”,“理应报酬较高”。

再考查实践,马克思和列宁在世的时候,都没有“倒挂”。马、列逝世后,所有信奉马列的国家,包

括他们的祖国德国、苏联在内,都没有“倒挂”。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,也没有“倒挂”。

可见,“脑体倒挂”?不是马列造成的。相反,是违背马列主义才造成的。

1957年是转折点

1957年,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。靠不断反“左”、防“左”才保住革命骨干力量并取得政权的中国领导核心从反“左”转到了反右。从历史角度看本该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才会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,提前在中国这么落后的国家里发生了。这种情况下,本应处处谨慎,尤其是“左”是需要时时防范的。历史一再证明,几十年来不注意防“左”而搞了“左”的领导人,一个个都错了。可惜,从1957年反右起“左”的思想和实践盛行,从“左”搞到了极左,一搞就是20年。一“左”再“左”,一错再错,给国家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。

灾难最重的是知识分子。因为,所谓“反右”,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。1957年一开“反右”先河,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收入,就每况愈下了。

反右之后不久,1958年随即调整了一次工资,大学毕业后的起始工资就从62元降到了56元,而小学教师的起薪则从60元降到了50元,后又降到了40元,再降到了36元。这还是指公办教师,“民办”教师更少,只有27元,别说养活一家,就连养活自己也困难了。于是,在那个年代里,甚至出现了“兰州某学校的教师家属40%外出要饭”的悲惨景况。这条消息是当年老教育部长蒋南翔披露的,大概不会有错。

“文革”结束时还没有形成“倒挂”。

1957年“反右”只是开始。此后运动不断,中国知识分子成了长期“改造”的对象,不断被送去工厂农村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“再教育”。到1966年“文革”,“左”变成了极左,“读书无用”变成了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。所以知识分子的日子就象王小二过年,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。

但是,从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到“知识越多越贫穷”,是需要一个演化过程的。这个过程还相当长,整整20年。原因是两个:第一,原来的脑体“正挂”比较大,知识分子“底气”尚比较足。第二,极左时期是“重政治轻经济”的时代,对知识分子着重于政治上的改造,钱的方面倒还变动不多。于是知识分子尽管地位一降再降,降到史无前例的“大革命”结束,收入也还没有“倒挂”。确切地讲,局部的“倒挂”已经有了,全面的“倒挂”还没有形成。所以,那时的知识分子虽已沦为“臭老九”,而许多人还自嘲为“臭豆腐”,闻起来臭,吃起来香。那阵子不少小女子嫁人,还是非大学生不嫁的。

脑体倒挂的全面形成是在1977年。

1988年的日本报纸就作过这样的判断,并且被

我们的“参考消息”引进了。

二年后,1990年12月,中国学者何祚麻等人在“科技导报”上发表文章,也指出脑体倒挂是1977年开始的。何文披露的数据对人们了解“倒挂”形成的历史沿革,很有帮助,摘要如下:

1927年,中国教授的最高工资是开滦煤矿工人的47倍。

1940年,中国教授的最高工资是开滦煤矿工人的10.7倍。

1957年,北京科技部门最高工资比工业部门高5.2元。

1975年,北京科技部门月均工资比工业部门仅高0.88元。

1977年,开始出现脑体收入差别“倒挂”现象。

进入80年代以后,“脑体倒挂”加剧。

中外学者研究“脑体倒挂”,都得出了1977年是中国“倒挂形成年”的结论。这个结论,和2000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切身感受,也是吻合的。

“十年文革”把什么都颠倒了,而脑体差别却还没有颠倒。1977年“拨乱反正”,把很多事情都正过来了,但脑体差别却颠倒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很显然,“文革”结束了,极左并没有结束。自1957年后愈演愈烈的“左”持续了20年,不是一天就能化解的。加之当时又提出“两个凡是”,更增加了化解的困难。恰恰在这种情况下,长期冻结的工资在1977年作了一次大调整,知识分子当然是要吃亏的。由于“左”和极左,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吃了20年的亏了,再加上这次大的吃亏,“底气”终于亏光了。脑体收入差别也就终于从“正挂”变成为“倒挂”。

在“正挂”变“倒挂”的转折点上,处在一线的2000万知识分子是深有感受的。他们议论纷纷,上书中央。当时笔者也曾作了一番调查研究,写了一篇文章,并呈送最高决策层。

那篇文章,列举了“大学生毕业的哥哥收入不如当工人的妹妹高”等等不正常现象,指出了问题出在“左”字上;阐述了马克思复杂劳动的理论,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弥补措施。可惜,2000万知识分子要求改变“脑体倒挂”的呼声和理论工作者的有关建议,似乎没有人听到。于是,本来有可能不发生的事情,终于发生了。

之后十年,脑体倒挂继续扩大。

有人说,这些年来什么都涨价,唯独知识和废品贬了值。1988年同30年前相比,一斤米从一角涨到了五角,一斤肉从五角涨到三元,而废牙膏皮却从二分钱一个颠倒为一分钱二个,高级知识分子的起薪也从150元降到了120元。于是,“脑体倒挂”日趋严重了。

据统计,1982年北京脑力劳动者比同龄体力劳动者月薪平均少8元。到1984年,《人民日报》有“大学生收入不如保姆高”,“40岁中年知识分子的收入不如20岁的临时工”的报道。到1987年,海外报刊介绍了“北京郊区20岁的女工月薪150元,卖冰棍的老奶奶一个月收入300元,出租司机月收入1000元”,全部比50岁才晋上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收入高。于是,“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”一类讥讽民谣,也就盛传不衰了。

知识与废品为伍,这是对“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”的极大讽刺。可见,有了正确的口号,没有力挽狂澜的断然决心,仍是无济于事的。

解决脑体倒挂的关键在克服极左。

有人把这些年没有解决好脑体倒挂归因于“中国太穷”,“国家财政有困难”,是不正确的。

因为,30年代中国更穷、更困难,可以不“倒挂”。50年代中国刚打完几十年的仗,百废待举,而国家财政收入才百亿元左右,也可以不“倒挂”。80年代国家财政收入数千亿元,却反而解决不了“倒挂”,是讲不通的。

连吃饭都成问题的非洲国家也可以不倒挂,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的中国,“倒挂”却一年比一年严重,是说过去的。把“倒挂”归因于客观,是没有道理的。

上面的调查考证已经很清楚;脑体倒挂与天地无关,纯是人为的;与洋人、古人、敌人、友人无关,百分之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;与钱多钱少关系也不大,关键是对待知识分子“左”的认识、态度和政策造成的。所以,我们不要怨天尤人,不要推给客观,不要推给将来。只要认真清除“左”的影响,把中国改革中“最重要的一条”——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很好地加以落实,问题是不难解决的。

(责任编辑 蔡德诚)

(上接第24页)

磁材料的发展、计算机的应用等,FEL今天的成就是绝不可能的。因此,要想开辟科研新领域,有所创造,有所发明,就必须注意技术积累,长期锲而不舍,精益求精,大处着眼,小处着手,才可能最后做到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群山小”的境地。最后,应当指出,FEL的发展还说明了科研工作中的一个正反馈

现象。FEL需要加速器提供品质极好的电子束,而另一方面,高能电子加速器的发展(下一代的正负电子对撞机)也需要FEL研究的成果,如提供功率源、高亮度注入器等。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,必将促进科学技术以更大的速度,向更高层次前进。

(责任编辑 蔡德诚)